

前沿文化纪事



唐瑜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前沿文化紀事



唐瑜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沿文化纪事 / 唐瑜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360-5505-6

I. 前… II. 唐…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0672 号

责任编辑: 余红梅

封面设计: 贺 维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5.875 4 插页

字 数 10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给历史留下一些旁白

我在这本书开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这一写作的过程，是不经意地开始的。既然我已经翻动了历年的笔记，向编书、编志的几位同志介绍了当年的历程，写起来也就不是什么难事，无非是把说过的变成写的，因而动手写了一篇并送出去了，不想这一来就逐步“陷”进去了。

我是在1979年初，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从省委机关大院转到省文化厅（局）的，是排在第七位的副局长。那时还没有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厅局一级的干部也是老化状态。我当年已是49周岁，仍算是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由于这个机缘，到了1983年领导班子换届并提出要实行离退休制度时，我被任命为厅长兼党组副书记（后兼党组书记），至1988年领导班子又一次换届时，未强调干部轮岗，我被继续任命，直到1991年夏天才退下来，之后让我转到省文联干了几年，这对我应说是超龄服役了。这就是说，我恰是在改革开放起始年代站在文化前沿的，我曾亲自看到那历史大潮逐步涌开、奔腾起伏的画面，听到它咆哮、喘息、再咆哮向前的乐曲。

那些知情的和曾经共事的朋友都鼓励、支持我继续

往下写，还把它提到职责感的高度，说你知道的比我们多，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他们给我出主意，选题目，查笔记，提供各种资料。《广东艺术》与《广东文艺界》（内部期刊）两个编辑部对我送去的稿件很重视，分别发表了前面的几篇，并嘱我继续送搞。面对着这些朋友的热情关注、帮助，我还能说什么呢？！人活着总还是要干点事的。

我不是正面写历史，我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任务。省文化厅内那些不是我直接管的业务，我也不甚了了，如群众文化、文物博物、电影发行等。我只是写我个人在改革开放中感受较深的事，我作为一个中层文化官员所接触的情况，我的惶惑和为难，包括某些当时没有公开的内情。没有公开并非指什么机密，文化部门没有很多机密，现在回头说一说无非是可以让人们增加对历史的了解，知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总之，我写的只是历史的一些侧面，是历史的旁白、补白。请朋友们别期望太高。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的，但这个精炼概括的提法是后来才逐步形成的，当时没有完整配套的政策规定，是摸着石头过河。多年左倾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禁锢着许多官员的思想；我们自己就有很多禁忌。我们的国家是个大一统的国家，什么事都要揽着，反过来说是什么事都要请示，没有红头文件的指示不行，有红头文件也不一定都行，改革开放其实起步很难，很难。

在我们这个“小文化”领域，改革开放排头的一件大事，是1979年5月省粤剧院组团到港澳演出。那是经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指示广东办的，以中国广东粤剧团的名义前往访问演出。粤剧对香港是禁锢30年后首次开禁，轰动一时，影响很大，那时称获得政治上、艺术上、经济上“三丰收”。当时已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胡耀邦等在演出简报上欣然批示，鼓励多派团出去，具体说到每年应组织二三十个艺术团体赴外国（及地区）演出；国务院随后将广东对港澳地区文化交流的审批权下放给广东。这件事是按红头文件办的，没有阻力，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气呵成，一锤定音，令人振奋。

接下来的又一件大事要数音乐茶座或说是流行音乐、轻音乐引发的冲击波，与它相随的有跳舞以及通俗文化一度火爆，随后还有文化市场崛起。这些可不同于派出艺术团体而是给自己引进西方文化了，对我们就成为棘手的事，一桩比一桩棘手。在那个电话机、录音机未普及，文化生活单调的年代，是更多地考虑群众的不同需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还是受束于原来的观念，这也不准那也不行呢？这些事可没有红头文件，所遇到的指责、诘问以及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常令人左右为难，啼笑皆非。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都曾为这类事一再过问和表态，北京来人不打招呼到歌厅、舞厅去现场观察，可见这些事还牵动着上层的神经中枢。我们这个中层不得不承担着各种压力，并不断做好各种善后工

作。如果人们当时都像今天站的高度，看出那是风险与机缘并存的年代，那时引起的争论、碰撞也许会好办得多。好在是形势比人强，改革开放大潮终于哗哗地压倒一切噪音冲刷而过，我这里就不再重述书内已谈过的那些具体情况了。

从省文化厅本身的职责来说，我也许应谈谈有关艺术（戏剧）创作方面的事。由于前面谈的情况，我本来只是想写篇把文章，一开始就简单介绍了广东在全国首先举办艺术节，我想就不再重复这个话题了。广东在那个年代也曾出现“被称为中国第一水平的作品”（原省剧协主席李门），只是那个能让它激起轰动效应的历史背景已经变了。另还有艺术团体的改革，广东也曾投入不少精力的，但它仍在深化中，尚未定型，也就不谈这种见仁见智的话题了。

一年多来，我边想边写，陆续写出了这本书内的一串往事。其中，有一篇介绍王洛宾广州音乐会的文章则是十年前为哀悼“西部民歌之父”王洛宾逝世而写的，当时写得比较简单。后来那些知情的朋友要我补充，说“王洛宾晚年的辉煌是从广州音乐会开始的”（王洛宾文集主编刘书环）。事实如此，在广州举办重要的演出、展览活动，有一种向海内外辐射的作用，王洛宾就是一例，因而我将那篇文章作了补充。这是我们这个南大门的奉献，也是一页历史。

作为对那些年代的回顾，是不是也可以从大文化的

角度，即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进行研讨？这就超越我的职能了。我也欠缺这种思想水平，不敢冒昧发言。

我从岗位上退下来后，曾为几位朋友写了文章，都是曾为改革开放尽力并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人，另还有两三篇属于个人的回忆文章，现也借此机会编在这里。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即使不封笔也要“封”书了。

目 录

前 言：给历史留下一些旁白…………… (1)

前沿文化纪事

——广东的若干个“全国第一”…………… (1)

建新图书馆轶闻等两三事

——《前沿文化纪事》(续一)…………… (22)

诚待五洲四海的文化要员

——《前沿文化纪事》(续二)…………… (40)

刷新省级文化设施旧貌

——《前沿文化纪事》(续三)…………… (57)

把观众引进艺术殿堂

——《前沿文化纪事》(续四)…………… (66)

蜚声中外的王洛宾广州音乐会

——《前沿文化纪事》(续五)…………… (74)

老大和伙伴们

——《前沿文化纪事》(续六)…………… (79)

在悉尼的日日夜夜

——《前沿文化纪事》(续七)…………… (88)

我怎样写起出访随笔来

——《前沿文化纪事》（续八）……………（120）

关于戊戟的信及其他

——《前沿文化纪事》（续九）……………（131）

官场窃语

——《前沿文化纪事》（续十）……………（139）

只有香如故

——怀念国画大师王立……………（145）

广东汉剧一代名旦梁素珍……………（149）

那优美的旋律常在

——怀念徐东蔚……………（154）

不倦的挑战者

——《赵善富作品选》序……………（159）

这个盛世的一簇画卷

——《陈小明群众文化文集》序……………（163）

《河源革命历史诗歌选集》序言……………（166）

走出“牛栏”“牛班”之后……………（169）

在大军渡江当晚……………（174）

附录：唐瑜简介……………（178）

前 沿 文 化 纪 事

——广东的若干个“全国第一”

几位编书、编志的朋友，不久前分别要我忆述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工作的情况。我作为那些年省文化厅的负责人，责无旁贷；我翻箱倒柜地查阅各种资料，给他们作了详细介绍。他们说万事起头难，当年是要有“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啊，或还鼓励我写点回忆录。现在来说那些事比那时说方便，也算是对历史的一种交代吧！

从音乐茶座谈起

文化界一些人士曾乐于数说广东有多少全国第一的文化现象，第一是指它出现最早，其实好些是从海外传进来的。当时被列出多少全国第一，都是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但开头的几个：第一个音乐茶座，第一个轻音乐队（团），第一个轻音乐调演和第一个舞会（歌舞厅）等，我可说有点缘分，就从它们谈起。

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改革开放的号角像春雷撼动了南方大地，尽管大家还不明白将会怎么改，但总感到有奔头了。那时省文化厅仍称文化局，我刚调来一年，是排在后面的一位副局长。我分管艺术



记得我们都曾年轻

处，即管理艺术业务和省属艺术院团。这时我不断听到各艺术团体反映，说现在队伍管不住了，演员纷纷跑到社会上“炒更”去了，那些场子不关掉可不得了啊。我让艺术处派人去了解一下。所派去的人说，那都是旅游部门办的，要进去得购票，还要有外汇才行。我说那就借点外汇券嘛！这样摸到门路之后，我也随着去看了几家，这可让人开眼界。

当时正式开办音乐茶座的可能只是东方宾馆一家，每晚邀请若干演奏员去演出（过后它才自行组织乐队），其做法与我们的正规演出场所大相径庭。观众不

是规规矩矩地排排坐的，而是分别围着小桌子边喝茶边听歌的，所演出的几乎都是来自港澳和海外的流行音乐，又称为通俗音乐或轻音乐，表演方式也变了，原来都是端端正正站在舞台正中歌唱的，一下子都变成拎着话筒边走边演唱了。

办舞会的则已有好几家宾馆了，我这里称“会”而不说舞厅，因为我看到的都不是专设的舞场，而是利用餐厅、会场在晚间举行的，无非改一改灯饰，找几个伴奏的乐手就行了。从音乐茶座到这些舞会，所到之处都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这种事本不属我管，严格地说是没有划给哪一位或哪个业务处管。它是既非国办文化，又非群众文化的另类，是属于经营性的。我当时在省文化局领导班子中相对年轻些，年少气盛。我向来也不是碰到问题绕路走的性格，凭着一股热情就把它揽到手里了。当然，我办的事和草拟的文稿都按程序向党组汇报并得到党组支持。

我不懂音乐和跳舞，但我深信有这样多观众喜欢的轻松抒情活动是应该让搞的。可虑的倒是它的经营谋利性质会带来某些消极面，但我又认为那是可以通过管理来防止和纠正的，不能因噎废食，嫌洗澡水脏把孩子也泼掉了。

那时已是1981年初，我与艺术处的王光恒经反复商议起草了调查报告和有关规定，经党组讨论修改后按规定程序报送省委宣传部转报省人民政府。期间，省委宣

传部曾要求我们作了一些修改，之后，经省政府征求省公安厅、省工商局意见后，又将所反映的意见让我们进一步研究修改。两次的意见都是针对舞会提出的，担心它对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负面影响，也不排除某些领导看不顺眼。我们于是对它缩小了开放的口子。经这样文件往返，前后半年多总算通过了，这就是这年11月17日以省政府名义颁发的248号文《关于开办舞会、音乐茶座和专业艺术人员参加对外演出录音等活动的暂行规定》。

这个文件，在音乐茶座方面采取了放开的做法，允许举办音乐茶座和组织乐队演出，要求节目健康，接受文化部门的指导。在舞会方面采取有限制的开放，限于为外宾开设营业性舞会，同时，允许娱乐场所举办群众联欢舞会（由单位包场）；另对专业艺术人员参加各种对外活动作了相应规定。这个文件适应了当时文化生活的需要，各种音乐茶座、舞会风靡一时，由大城市向沿海城镇扩展，特别在广州市，轻音乐创作因有了这个驰骋的天地，发展很快，许多动听的乐曲在年轻人中传唱，市文化部门几次举办乐队调演，电视广播部门多次举行轻音乐作品评选，省歌舞剧院组成第一个轻音乐团，广州地区的轻音乐创作连年领先于全国，后来虽退位于北京、上海，但仍居前列位置。各大中城市的舞会将许多求新求乐的青年卷进去了，原来限定的口子被各地逐步变通扩大了，音乐茶座也逐渐变成歌舞厅。这都

留在后面再说。现在回头来看就更清楚了，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为文化市场开了绿灯，踩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事物就按照它固有的规律运转起来了，形势比人强。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文化部负责人事后到广东视察时，说我是全国最早研究文化市场的厅长，中央媒体曾对此报道。这是一种巧遇吧！由于这一因缘，可没有给我少惹麻烦，像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来了。

文化市场的风风雨雨

随着轻音乐、舞会两个项目之后，一个包括多种文娱项目、文娱用品（音像品、电子机、卡拉OK）和多种文化服务（书报摊、桌球室、音像播放点）的文化市场悄然出现，并由南至北，由城市向乡村扩展。因那时省里没有明确让哪个部门管，也囿于原来的观念，没有说它是文化市场，我们只统称为社会文化活动。这时省文化局已改称省文化厅，我接任厅长。我们倒是鉴于这种变化，分工由副厅长郑泽才和群众文化处（现已改为社会文化处）分管这类有关业务，我因职责攸关也经常参与其事，我出的主意其实也不全出于我个人。

这个市场一开始就是在质疑声中诞生的，随着它的扩展，尤其是它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各种难听的话就更多了。我们为此花了不少力气，按我们当时的认识程度帮助纠正那些不健康的节目。我有时在剧场陪老同志

看演出，有些老同志看不顺眼，忽然把一旁坐陪的主办人剋了一顿，我不敢过分，只好尴尬地不做声。轻音乐在一些专家眼里是靡靡之音，也确有内容凌乱低俗的；表演方式一直有争议，广东的艺术团体到外地演出时被通知只能容许两个人拎着话筒演唱，以致于连省委书记任仲夷都要为此一再说话，其中一次是当面告诉我的，说党不需要管演员是拎着话筒唱还是站着唱的事。这话的深意就在于他是对我这个“专业”厅长说的。

1983年10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了，刚宽松一点的气氛又变得严肃起来。有些知名人士见风起哄，马上指责文艺界是精神污染重灾区。有关领导部门、媒体连续到省文化厅问有哪些污染。我最怕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局面，赶紧就平时所见的写出几条“污染”现象让办公室的同志掌握，不瞎掺和，对已经放开的坚持原来的态度，以求维持政策的稳定性。这个10月下旬，省群众艺术馆举办的轻音乐讲习会请我去讲话，我联系音乐茶座问题表了态；《羊城晚报》资深记者赞同我的态度，以《清除精神污染，办好音乐茶座——省文化厅厅长唐瑜提出要求》为题，在该报发了消息，据说轻音乐界见报后，不少人松了口气，说还可以办音乐茶座啊！从报社到轻音乐界的反馈也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11月下旬，北京召开全国文化厅长会议，外省对广东的眼光是新鲜又好奇的，大家知道文化市场这股风是

从广东向北方吹过去的，看你广东怎么表态。会议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我认真写了发言稿，逐字逐句照念，也是这个态度。会议最后请一位中央有关领导讲话，是最重要的定调子讲话。他集中地谈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这与过去搞运动先轰起来再说截然不同，是上头听到各地反映后所作还是本就是打算，我就不清楚了。这个讲话卸下了我肩上那股压力，有了具体界限也方便掌握了。从北京回来后，我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布置了文化系统怎么清除精神污染。接着，遵照省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我向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除了谈省文化厅怎么贯彻执行外，建议省里对各项社会文化活动进一步明确管理归属，并在县以上的文化（局）部门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从北京的会议到省里的会议都是严肃而实事求是的，大家都爱惜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又希望不出现污染的倾向。就我们这个“小文化”系统来说，当时要清除的东西也不算太多。

舞会是我们管的项目中比较烫手的，其经过有点曲折，我要在这里插上一段。舞会初时开放的口子小，只限于举办由单位包场的群众舞会，秩序良好，连公安部门也赞赏，所以我们检查“污染”的时候没有触及它。后来被各地逐步变通，扩大了范围，问题就多了。多数舞厅跳的是迪士科（它简单易学），这个舞让不让跳，连省委书记、宣传部长都亲自过问，不过问归问，都不轻易表态。我曾请省群众艺术馆的同志编了一套迪士科